

著名文学理论家曾是间谍？

文/理查德·沃林 编译/本报实习生 施美均

“噢，我试过‘左岸’那套。大学的时候我经常跟胳膊底下夹着好几期《如是》(Tel Quel)杂志晃来晃去的人一起玩。我太了解那些垃圾了，那东西根本没法读。”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反生活》(The Counterlife)

Illisibilité——意思是“不可读解性”，在20世纪60年代，《如是》作者们把这个修饰词像一个荣誉徽章一样佩戴在身上。那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潮流风靡的年代。但一些左岸知识分子并不怎么迷恋这份刊物倨傲的符号学阐释学风格，他们指责那些经常在《如是》杂志页面里出现的文人们——这是一个读起来像“法国理论”名人录的名单——操练着“理论上的恐怖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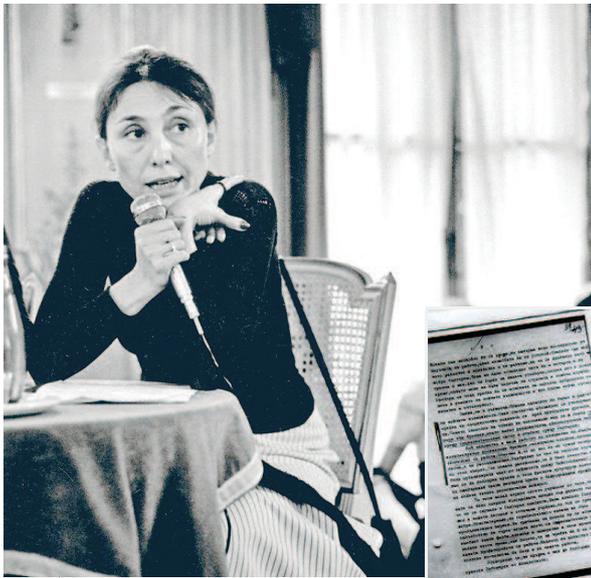
70年代有一个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这样调侃结构主义在语言上的拿腔做势：

问：一个黑手党跟一个结构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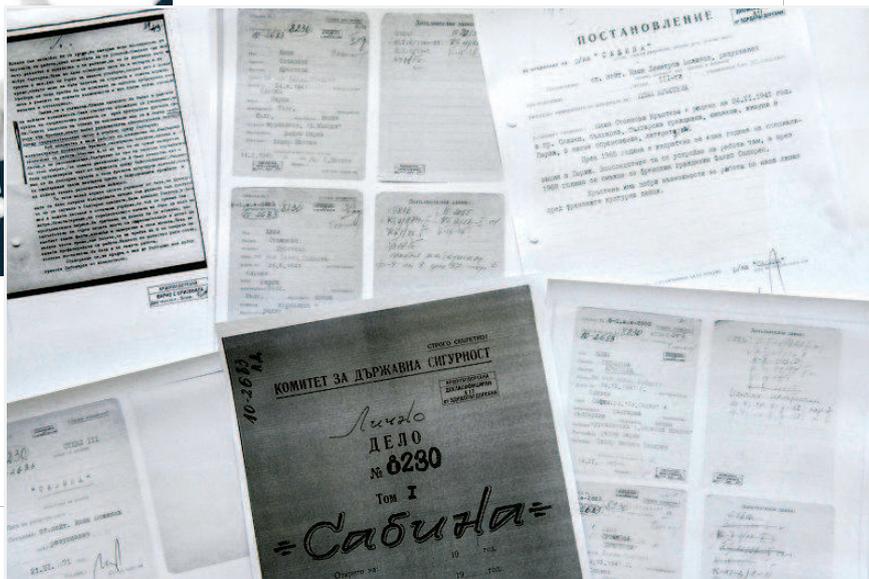
答：后者在跟你要价的时候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跟法国不一样，《如是》在北美高校似乎依然拥有一批稳固而恭敬的拥趸。尽管如此，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如是》智囊团的结局相当惨淡，其中领头的是才华横溢的、憎恨标点符号的菲利普·索莱尔(Phillipe Sollers)。(从1974年到1981年，每一期《如是》的开篇都节选自索莱尔不加标点的未完成作品《乐土》[Paradis]。索莱尔解释说他不加标点是为了反叛“形而上学暴政”：“标点就是形而上学自身，就是它的具身化，包括空格和格律也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如是》陷入窘境，索莱尔不得不和他的妻子、联合编辑——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一起终止了他们的整个事业。1982年，《如是》骤然停止发行。同年，在做了一些编委上的调整后，它被更名为《无限》(L'Infini)。

最近，克里斯蒂娃被指控曾给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DS, Darjavna Sigournost)当过间谍，基本上，DS就是保加利亚的克格勃。在审视和评价这个事件的时候，《如是》的不



▲克里斯蒂娃在巴黎，1977年



▼保加利亚情报档案复印件 资料图片

幸遭遇又浮现在人们的脑海。根据DS的档案，克里斯蒂娃在70年代持续进行了7年的情报活动，但保加利亚情报部门似乎在1965年就第一次联络上了克里斯蒂娃，恰好就是她以一个享受奖学金的24岁学生的身份前往法国前夕。根据档案的陈述，当被告知在未来的某些时刻可能需要她的服务的时候，“朱莉亚同意了”。

颇具声望的法国杂志《观察》(L'Obs)(原《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在三月末最先报道了关于克里斯蒂娃被指控与保加利亚情报部门有牵连的细节。4月初，《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刊载了此次事件的要旨。

克里斯蒂娃方面则是强烈地否认了指控。她声称这些指控都源自一项蓄意诽谤她的行动，还把曝光出来的档案驳斥为“假新闻”。

4月，克里斯蒂娃的律师，让-马克·费迪达(Jean-Marc Fedida)在《世界报》(Le Monde)上发布了一封强硬的文字声明，威胁要对故意传播这项尚具争议的指控的记者和新闻媒体采取法律措施。费迪达告诉《世界报》，克里斯蒂娃

“对她的行为和工作竟由于一些文件而被质疑感到愤怒……这些文件可笑地使用了极权主义的警察手段”。换句话说，不是克里斯蒂娃而是那些指控她的人才真正的极权主义者。然而，目前为止，她拒绝解释哪个人有可能指挥了这场针对她的诽谤行动，也没有说明这个罪犯的动机何在。

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克里斯蒂娃的传记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爱丽丝·贾丁(Alice Jardine)附和了她的无罪辩护。贾丁告诉《纽约时报》：“对她或者她的作品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这项指控。”

克里斯蒂娃的支持者们之所以不愿意关心保加利亚情报档案陈述的事实，很可能是因为在80年代“法国理论”风潮在北美文学研究界的深远影响犹在。而且，这些人现在依然被克里斯蒂娃这位弄潮名流的光晕所魅惑。因而，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法国政治历史学家弗朗索瓦·乌尔芒(François Hourmant)描述了《如是》在美国受到的不寻常的“认可与敬重”。弗朗索瓦·多瑟(François Dosse)的两卷本《结构主义史》(History of Structuralis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也佐证了彼时弥漫着的对克里斯蒂娃作品不加批判的追捧情绪，他

写克里斯蒂娃抵达巴黎的一章的标题叫作——《1966：奇迹之年(Annum Mirabile)：朱莉亚来巴黎了！》。对“法国理论”的拥护者来说，这一事件将会成为传奇。

不过，正在此时，经一批专家鉴定，保加利亚情报档案是可靠且可信的。负责档案审查的叶卡捷琳娜·邦切娃(Ekaterina Boncheva)说：“在我工作的这十年里，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伪造的档案……如果克里斯蒂娃对曝光出来的材料有疑问，她应该去找DS而不是我们。”

讽刺的是，是克里斯蒂娃自己无意间触发了此次曝光，因为她曾试图加入一个总部在索非亚的文学机关刊物《文学期刊》(Literaturen Vestnik)的编委会。正是这一举动令她的档案接受审查。

在指控首次曝光后不久，“解密委员会”就在网站上完整地公布了克里斯蒂娃的档案——差不多有250页，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娃的DS登记卡，证明了她在1970年被成功招募的。据称她在DS的代号是萨宾娜(Sabina)。注册卡写道：“朱莉亚·克里斯蒂娃，1941年出生于斯利

文村”。尽管此前曾曝光过东欧国家安全部门伪造或者销毁个人档案的先例，但要说整个档案全都是伪造的，这样的事情就算不是史无前例，那也是很不寻常的，更何况克里斯蒂娃的档案体量如此之大。

主管“柏林间谍博物馆”研究部门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内林(Christopher Nehring)在检查过克里斯蒂娃的卷宗之后说，大批量伪造像克里斯蒂娃这样规模的情报档案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么做需要设计冗长的访谈、索引卡、登记记录、档案笔记和签名，同时还要复制当时DS采用的特定颜色和型号的纸张。

克里斯蒂娃声称自己是被迫卷入其中的——根据卷宗的记载，在1974年的春天，克里斯蒂娃有一次约定与她的DS上级见面后却放了他鸽子。后来，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克里斯蒂娃从布鲁塞尔给巴黎的保加利亚使馆发了一张请求和解的明信片，表达歉意的同时也承诺她在度假结束之后立刻就跟他们恢复联络。然